

# 群体传播的心理机制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 群体是组织基础,群体传播的心理机制也就是组织传播心理机制的基础。本文讨论群体传播的诸问题:群体意识、群体思维、群体压力、集合行为及其心理机制,以便为进一步的组织传播研究奠定铺平道路。作者认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应该对群体的情绪宣泄保持警惕,因为这类宣泄往往不可预测性,极不稳定。理性的社会需要民众从群体思维转向公民意识,而这一转变需要道德和法治教育。

**关键词:** 群体传播 组织传播 群体意识 群体思维 群体压力 集合行为

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16.01.013

“组织”和“群体”在概念上是有差异的。“组织”(在中国习惯叫“单位”)是指结构相对严密的群体,有分工和内部规范,存在时间相对较长,有成员的确认程序和管理层,有特定的目标,组织成员有共同的志趣、观点或信仰。而“群体”通常是指分散的人的暂时集合,联系松散,自发形成,例如街头围观的人群、某一传媒的受众、某场球赛的观众等,他们的传播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某些群体成员之间可能会有较长期的关系,甚至有一定的习惯性的聚会场所和时间(例如牌友聚集、传媒编辑部每天的编前会)。

具有明确社会组织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就上升为组织传播。对社会的人来说,组织传播是一种不可能摆脱的社会存在。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逊(Robinson)遇到漂流到岛上的黑人“星期五”,开始他们之间的交流是普通的人际传播,一旦他们之间确定了一种关系,于是,萌芽状态的组织传播便开始了——鲁滨逊以主人的身份与奴隶星期五之间发生传播关系(这是一种统治关系带来的传播关系)。

随着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交往,一些人发现他们有着相近的目标或利益,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或利益,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于是大家会进行协调、联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松散的或严密的组织。与其说社会是由无数单个人组成的,不如说社会是由无数这样的组织构成的。

然而,组织本身并不能自动实现目标,需要人们在组织内外通过不断地交流形成共识。现代社会的人离不开组织,其实都在一定的组织(而且往往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属于不同的组织)内外进行着有意无意的多种形式的传播活动。

群体与组织在传播过程及传播目的、效果、影响等方面有明显差异,组织传播有自己独有的原则、模型、动机。但是,既然群体是组织基础,群体传播的心理机制也就是组织传播的心理机制的基础。所以,我们需要首先讨论群体传播的诸问题,才能上升到对组织传播的研究。

## 一、群体意识与群体思维

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是参与群体或组织的成员所共有的意识,它包括群体感情、归属意识、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群体意识是群体传播作用下的结果,一旦形成就会对群体成员的个人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作用。



群体意识的形成与群体内部的粘合性(cohesiveness)有直接关系。粘合性指群体成员之间彼此感兴趣的程度,也就是彼此认同的程度。如果大家彼此在意对方、认同对方,粘合度就高,群体意识也就越强,反之,粘合度就越低,群体意识也就越弱。我们通常所说的凝聚力,就是指粘合性较高,这也是群体意识的一种表现。

对于群体或组织来说,群体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像胶水一样,把群体或组织的成员聚合在一起,使成员们把关注点放在维系群体的团结上,相互依赖,遵从群体规范,从中得到安全、友谊、威信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当群体意识足够强时,便形成群体思维。

群体思维(groupthink)是由厄文·贾尼斯(Irving Janis, 1918 - 1990)首先提出来的一个假设,指当群体中间达成一致诉求的需要足够强大时,谨慎的思考和合理的决策就会丧失,甚至一些群体或组织成员会为了维护群体或组织的和谐一致,会压迫不同意见,或者,如果意见不一的争论可能影响到和谐一致,成员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观点和明智的决策,而顺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其结果是群体缺乏批判思维,成员们更愿意讨论简单明白、多数人赞成的解决方案,以便迅速达成一致。显而易见,这时群体或组织成员之间满意度很高,可是有效性却很低。



图1 贾尼斯《群体思维》  
英文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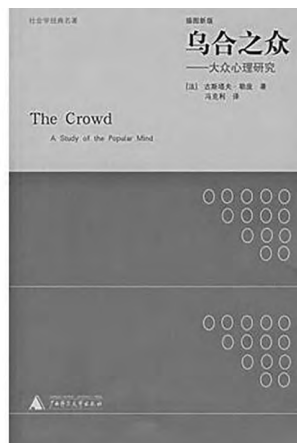


图2 勒庞《乌合之众》  
中文版封面

组织内的群体思维往往更普遍。打破群体思维有时是做出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尽管一般来说达成一致是一个群体所追求的特征之一,但是如果走到极端,那么它也变得毫无功用甚至具有毁灭性。”<sup>[1]</sup>

## 二、群体压力

群体压力是群体中多数意见对个体造成的心理压力,迫使个体(或使得个体盲目)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来描述经济个体的这种跟风心理;哲学家认为这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导致的,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人类的从众心理;社会学家认为这是人类的

集体无意识。

群体压力与权威或制度命令不同,它主要付诸于人的心理。作为社会性的人,人们有着合群倾向而避免遭到心理孤立和制裁。同时,基于对生存环境不确定性的判断,人们倾向于认同多数人的意见,以获得心理安全。

群体压力导致组织成员在行为上的“从众”现象。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从众”是“为了保持某个群体确立的准则而做出的努力,它是一种对普遍行为方式的自觉模仿”。<sup>[2]</sup>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希(Solomon Asch, 1907 - 1996)对此的阐释是:“为了追随别人,人们宁愿放弃自己的正确意见。”<sup>[3]</sup>群体压力导致的从众行为作为一种协作,有利于节约时间和精力,但也会导致不假思索地进行决策和行为。

传播学中“沉默螺旋”的理论假设,实际上就是群体压力之下的一种现象。在一个群体或组织中,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很少有人理会或遭受群起攻之,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因而形成舆论的螺旋发展过程。

## 三、集合行为及其心理机制

即使再松散的群体,也可能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非常态的集合行为,它不受现有社会规范控制,具有人数众多、自发、无组织的特点。引起集合行为的刺激既可以是社会结构性压力,比如由于失业、物价、政治歧见、民族冲突、自然灾害等,也可能是某一个突发事件或刺激性信息。集合行为多以群集、骚动、恐慌奔走、流言散布的形态出现,所以往往会干扰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集合行为的传播机制包括群体暗示、群体模仿、群体感染等,相关理论包括模仿理论、感染理论(contagion theory)、匿名理论等。

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 1843 - 1904)是社会心理学中模仿理论创始人,他认为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由互相模仿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一切社会过程无非是个人之间的互动,不存在任何超越个人心理体验的实体,每一种人的行动都在重复某种东西,是一种模仿。根据塔尔德的模仿理论,模仿分为无意识模仿和有意识模仿,集合行为中的模仿更多地表现为前一种,当人们面临突发事件或被卷入突发事件中时,他们往往丧失理智状态,失去自我控制能力,也就更容易本能地模仿他人,力求与在场的大多数人的行为保持一致。

对群体心理机制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 - 1931),他把被某些因素激发起来的大众看做乌合之众,冲动之下他们往往表现极端,情绪夸张,偏执而专横,还容易轻信,易受暗示。他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sychologie des Foules)(图2)中指出,人在群集时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在群集情况下,个体会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自己的责任

意识乃至各种约束,这时即使是最有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

勒庞提出了感染理论,认为激情和情绪传播程度的增加,会使得群众的无意识思想通过一种神秘物作用互相渗透,暗示的影响使集群心理朝着某一方向发展,导致群体中的成员以相同方式行动,个人的理性思考和自我控制减弱甚至消失。在相互感染的作用下,个体会被一时的冲动所主宰,卷入非理性的狂乱之中。他在书中记述,法国大革命时群众攻占巴士底狱,狱长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对待,而是被愤怒的人们捆绑并殴打折磨,人们大声疾呼着如何处置他,烧死、吊死或者别的什么。此时一个因为好奇而赶来凑热闹的屠夫看着众人对狱长的羞辱和折磨,也狠狠地踢上一脚,痛打一顿,得到了人群的欢呼,他志得意满,因为他的行为被赋予了革命的崇高意义。

激情之下的群众往往凭直觉行事,野蛮粗暴、喜怒无常。并且此时的人显现出色厉内荏、欺软怕硬的本性,这种本性挟裹着每一个人,致使他们一见到稍有不同意见的人,就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势头极其迅猛。祖籍保加利亚的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的《大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一书中记叙了一件往事:1927年他亲身参与了维也纳群众焚烧正义宫(司法部)的事件。当时,他夹在人群的洪流中,感觉到自己完全交融在其中,一点也不觉得群众放火是违法的行为。他写道,“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铭心。那是我经验中最接近革命的一次……我成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对人群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丝毫抗拒”。呐喊的人群使个人思维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彻底消失。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的狂热中,也能找到感染理论的佐证。

群体传播的实际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处于非理性的状态。徐贲谈到这种现象时写道,“受激情驱使的人群涌上大街,横冲直撞时,他们似乎找到了‘说话’的地方。不过,说话不等于交谈,交谈也不只是说话。大街不是一个交谈的地方,挟裹在情绪激动的人群中,人们挥舞着拳头,除了口号和呐喊,没有别的声音。这时候,他们的身体姿势本能地绷紧而亢奋,显露出对抗和战斗,而不是交谈的姿势。这样的姿势和空间有它自己的话语形式,那是一种由‘带头’和‘跟随’形成的语言。它首先是带头者的命令、警告、威胁和谴责。之后,经过重复和模仿,变成了追随者的赞同、欢呼、重复和奉承。它的作用便是宣泄,虽然人多势众,但并不形成真正的舆论。”<sup>[4]</sup>

集合行为中的个体,所以会做出他平时没有过的越轨行为,是因为他处于匿名地位。匿名理论认为,在集合行为中,每个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互不认识的陌生环境中,个人的标志就被掩盖起来,自己干的事别人不会知道,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或者责任被分散,构成法不责众的心理态度。“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

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sup>[5]</sup>在2004年因搬运工(当地称“棒棒”)被打引发的重庆万州事件中,参与打砸烧行为的人大多就怀着这样的心理。2012年因钓鱼岛事件引发的国内反日游行中打砸日系轿车的人亦是如此。当然并非所有的集合行为都是如此极端和非理性,比如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总体尚是理性的。

信息流动状态是影响集合行为生成和走向的重要因素。塔尔德在1901年的论著《舆论与群集》(L'opinion et la foule)中,对舆论的结构及其形成、运动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报刊是公众的“精神纽带”,它在“理性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up>[6]</sup>如果包括报刊在内的正规的传播渠道不畅或者功能减弱,那么流言这种信息流动的异常状态就会出现。虽然流言信源不明,但是当事发突然并且涉及人们切身利益而又无法从正规渠道了解情况时,人们会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流言流通就会非常快。流言具有快速增值的特点,并且伴随大量谣言。2004年万州群体事件中“公务员打棒棒”、“打人者与警察握手”等谣言,就是导致群众认为警方处理不公而引发警民对峙局面的起因之一。

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应该对群体的情绪宣泄保持警惕。这类宣泄往往不可预测性,极不稳定。它们的特征在于,偏执而又显得高尚,专横而又似乎有理想,崇高而又暴力。其崇高的理论,可以成功地激起了群体的高尚感情,诸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共同伟业等等,使得群体成员在崇拜和服从的氛围中感到很幸福,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其暴力倾向常常显得理直气壮。理性的社会需要民众从群体思维转向公民意识,而这一转变需要道德和法治教育。

#### 注 释:

- [1]特里·K·甘布尔,迈克尔·甘布尔.有效传播[M].熊婷婷,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91.
- [2]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05.
- [3]Asch, S.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52:468.
- [4]徐贲.群众激情宣泄的“羊咬兔子”[EB/OL].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fzqy/2012/1005/68735.html>.
- [5]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6.
- [6]塔尔德,克拉克.传播与社会影响[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7-228.

#### 作者简介: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